

中国多民族文化研究文库

主编：徐新建

蚩尤 与 中国文化

◎ 秋阳 著

出版社

中国多民族文化研究文库

主编：徐新建

蚩尤

与中国文化

◎ 秋阳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蚩尤与中国文化/秋阳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7

(中国多民族文化研究文库/徐新建主编)

ISBN 978-7-105-13967-5

I. ①蚩… II. ①秋… III. ①中华文化—远古文化—研究

IV. ①K2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9894号

蚩尤与中国文化

Chi You Yu Zhong Guo Wen Hua

策划编辑:石朝慧

责任编辑:石朝慧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100013

网址:<http://www.mzpub.com>

印刷: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290千字

印张:20.25

定价:48.00元

ISBN 978-7-105-13967-5/K·2457(汉1366)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010-58130041;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無為無不為為其
所當為是為也

秋陽書于馬年夏月

第仁兄共勉



贵阳甲秀楼合影



与龙光沛合影



访问周德瑞



参观良渚古城遗址



参观西泠印社



参观浙江省博物院



参观中华三祖堂



《谢六逸评传》（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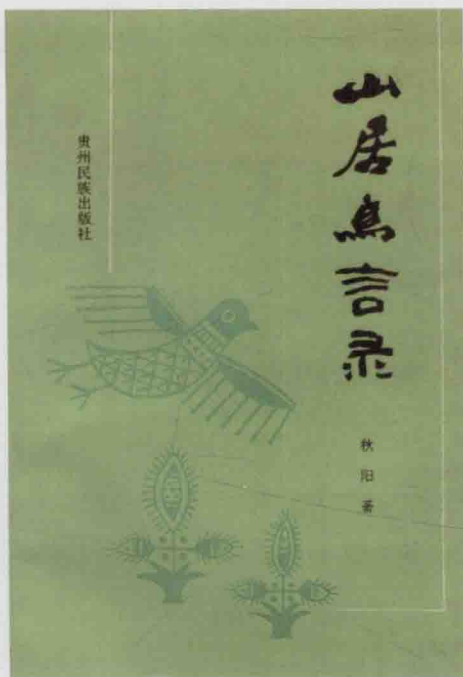
《李端棻传》（2000）



《苗疆风云录》（2003）



《闻鸟斋集》（2006）



《山居鸟言录》（1992）

目 录

序论：中国文化的源流	1
------------------	---

上编：蚩尤新论

重塑蚩尤形象	13
蚩尤在中华民族史上的地位应当受到尊崇	28
千古文明开涿鹿	
——华夏创世之谜（一）	41
蚩尤与良渚文化	
——华夏创世之谜（二）	52
神秘的良渚玉文化	
——华夏创世之谜（三）	61
壮哉，涿鹿	85
涿鹿大战：古代夷夏的互补和竞争	92
玉器划时代 良渚帝王洲	
——从考古发现穿越古国千年时空	106
黄帝与红山文化	131

东方有沃土 龙凤绣华章

——蚩尤传说的神话与现实	141
谁造方块字 创开文明门	181

下编：苗族文化及其他

苗疆六百年祭	205
外来宗教与苗族文化的磨合	
——“石门坎现象”激活的历史记忆	214
善恶忠奸各有报	
——谒北京田义墓	230
徐世昌：被遗忘的大总统	239
叹光绪之死	265
贵阳工厂史的发端及黔剧的诞生	271
三元宫乐善堂	
——昔日圣地今安在	278
有感于鄂尔泰诗勒石筑城广场	287
我对苗族文学的思考与践行	289
喜得“石后”话姻缘	300
又得奇壁见月蚀 丝路花雨再出新	305
我这一生	309
后 记	319

序论：中国文化的源流

提起中国文化的源头，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黄河母亲”、“黄帝始祖”。不过那已是古老的传统观念罢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发祥地，不止是黄河流域，甚至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东起大海之滨，西迄青藏高原，整个中华大地几乎都有中华先民活动的遗迹及其所创造的文化。如果说，在过去中国文化源流还是个难解之谜，那么，从多年来发现的数以千计的地下遗存中已日见明朗化。其中在云南发现的古代遗址年代最早，禄丰的腊玛猿和西瓦猿遗骸，被认为是“人类起源的新光芒”；元谋的猿人化石，则是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雏形，北京人、蓝田人还在其后若干万年；辽西的牛河梁神殿、东山嘴的祭坛、女神和女性泥塑群像，将中华文明期提前了1000年（从商周算起，只有4000年），被认为是“中华文明史的新曙光”，为“五千年文明史”找到了确凿的实物依据。东南地区良渚文化的发掘，被认为是夏朝遗址，这就纠正了夏朝起源于中原的旧说。这许多遗址都远离中原，并非一“母”所生。当然，由于年代久远，仅凭这些遗址，还不能将中华文明的原貌完整地再现出来，但至少可以断定，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源头不止一个，而是“海纳百川”，接纳了众多民族的创造，“有容乃大”。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其原因盖在此。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仍有固执一端的偏颇者。有的学者将其归纳为“几偏”，即“重血缘的狭隘观念”、“成王败寇的正统观念”、“天朝自居的汉族中心观念”、“忽视国内外交融的保守观念”，等等。用这

样一些偏颇观念去评述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其结论与史实相悖，可想而知。其所以有偏，就其立论的根据来源，仍然囿于“正史”和“黄帝”传说，没有跳出“夷夏之辨”的传统格局。然而，在事实上，仅就黄河流域来说，华夏族形成的时间以及作为族征的华夏文化，已经是众源融合的“流”，而不再是原始的某个族体（如黄帝）单元了。

黄帝与蚩尤之争，原本是传说而以神话的形式流传，从中可以照见历史的影子，但毕竟不是史实。历史学家将其引入正史，并以黄帝战胜蚩尤为其结局，意在树立黄帝的始祖地位，俨然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至高无上的创造者，对于战败的蚩尤则被贬为十恶不赦的“流寇”。然而，蚩尤尽管被打败了，仍不愧是英雄。他善造兵器，作战勇敢，曾经统领大半个中国，号称“九黎之君”的“巨人族”，最先进入中原地区。中原的开发应有蚩尤族的功绩。炎帝族是西方的游牧氏族，进入中部地区即被蚩尤驱赶到北方去。黄帝也是西方的游牧氏族，与炎帝战，三战才取胜。后来与炎帝联合攻打蚩尤，九战九不胜，幸得九天玄女赐符，才险胜蚩尤。战地上还留下蚩尤旗、蚩尤血、蚩尤冢、蚩尤城。后世尊蚩尤为“战神”以祀之，演“蚩尤戏”以示怀念。刘邦起兵都要“祀黄帝、祭蚩尤”^①。在当时帝王的眼里，黄帝、蚩尤都是圣祖先王，应当受到尊崇。范文澜在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毫不隐讳地认为，春秋时的华族、汉和以后的汉族，是由“黄帝族与炎帝族，又与夷族、黎族、苗族的一部分逐渐融合”而成^②，并非单纯的民族。华夏—华族是混血民族，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它是人类进化的结果。

中外学者都认为，“世界上没有血统很纯的民族，民族既非单元，文化也就不会是单元。反过来，文化越灿烂，民族血统似乎越复杂”^③。“广进异种者，其社会将日臻于强盛，而种界因之日泯”；“横览五洲之民，其气味繁杂者强，英、法、德、美之民，皆杂种也。其血胤单简者

① [西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1941），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③ 岑仲勉：《西周社会制度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弱，东方诸部，皆真种人矣”。^① 同化、融合是人类进步、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随着历史的演变和时代的进步，人们对此已有所了悟。近人梁启超认为：“华夏族，非一族所成。太古以来，诸族错居，接触交通，各去小异而存大同，渐化合以成一族之形，后世所谓诸夏是也。”^② 现代学者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指出：“今之中国号称五族共和，其实尚有苗、瑶、壮、蛮诸种，其族之大者，世称汉族，稽之史策其血统之混杂，绝非一单纯种族，数千年来，其所吸收同化之异族，无虑百数种。”^③

华夏族的形成如此，其他各族也一样。如果我们拓展视野，将目光放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沿着史前的历史进行考察，所见的远古文化就更为壮观了。

石器的出现，被认为是人与自然告别的分水岭。“人猿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④ 考古学家将我国新石器时代划分为若干区系，或称“三大经济区”，即黄河流域以种粟为主的旱地农业区，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以种水稻为主的农业经济区，从东北到内蒙古、新疆和青藏高原以狩猎、采集、放牧为主的游牧区。与之相对应的是“六大文化系统”，按地域分为中原、甘青、山东、江汉、江浙和燕辽等不同的文化类型。它们以其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铁器在制作、造型、结构和纹饰上的差异相区别，判定是在一定时期各自生发出来的相对独立的体系，但又不是静态的孤立存在。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遂形成了前后相继、具有不同特色的文化系统。考古文化，只是就古代先民创造的物质文明而言。然而，这些文化的生成与其创造者——民族是密不可分的。因而从这些物质遗存中不仅可以找到后世夏、商、周、羌、夷、楚、越、燕诸文化的渊源，而且可以看到已经消失了的三苗、蚩尤、后

① [英] 甄克思：《社会通论》，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② 梁启超：《饮冰室全集》，上海文化书局，1934。

③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192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④ 毛泽东：《贺新郎·咏史》。

羿等古族的影子,^① 还有一些学者进而将考古文化与民族系统相对应,提出了“三大文化系统与民族系统”之说,认为,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系统相对应的是羌族系统,与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青莲岗文化系统相对应的是濮越民族系统,与北方草原地区细石器文化系统相对应的是胡民族系统,并指出,这些民族及其文化系统,经过长期的相互不断交往、接触和融合,逐渐形成了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民族整体及其传统文化的坚实基础。^② 诸多考证,尽管角度不同,但其结论都认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是多元发生,相互影响,彼此交流,于是形成了众源融会的巨流,呈现出波澜壮阔、灿烂辉煌的宏伟景象。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华夷之别”。这是事实。它反映了众多民族的存在:华夏以外还有“四夷”——南蛮、北狄、东夷、西戎。因“华夷之别”,而有“夷夏之辨”。这也是事实。它反映了各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裔(边疆民族)不谋夏,夷不乱华”,彼此对峙,进而纷争交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民族(文化)史就是华夷纷争史。纷争也是推进融合的一种方式。历史上的“五胡乱华”,即由“乱”而“治”,打破了“华”为宗主,拒“胡”于外的对峙局面,实现了胡华一统;秦并六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统一;后来的蒙、满入主中原,其统一的地域更扩大;到了国民革命,遂有“五族共和”的大一统。但在某些人的观念里,往往只承认“华夏之别”,而不承认或者讳言“纷争”,羞谈“融合”;或者一谈“纷争”,则以“战胜者”自居,即所谓“成王败寇”,不承认“寇”(夷)也曾经称过王——入主中原。一谈“融合”,就是我化掉你——“以夏变夷”,“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而不承认“融合”是双向互动,彼此摄取。夏可以变夷,夷也可以变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人类经历了由蒙昧到文明的发展过程,其中有光华,也有血污。光华伴随着血污,否则就无所谓文明。中华民族也不例外。我们既要看到

① 叶文宪:《中国国家形成之路》,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6)。

② 格勒:《中华大地上的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4)。

光华，以此而自豪，也不必忌讳血污，为此而愧疚，因为那是历史。“一道浊流，固然不如一杯净水的干净而澄明，但蒸馏了浊流中的一部分，却有许多杯净水在。”^① 对待历史文化，应当取精用宏，汰其污浊。事实上，历史文化本身也是在优化组合的变革中向前推进的。优化组合的变革形式多种多样，交错杂糅，相映生辉。

一个民族的形成，既有血统的亲缘关系，又有文化上的认同。从血缘来说，“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②。是故“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合聚之道，故谓之族”^③。这里所说的族，即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氏族、部落。古代有“天下万国”之说，不过是一个个聚族而居的村落。这些村落之间以联姻的形式，构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更大族体——部落民族。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就是由羌、戎、狄、苗、蛮与某些氏族融合而成。

民族的形成，血缘固然是其纽带，但更重要的还是文化上的认同，即共同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等，而这些又都是由该民族居住的地理环境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所决定。中原地区是旱地，以种粟为主，其所生成的是旱地农耕文化；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温湿地区，以种水稻为主，其所生成的是稻作农业文化；北方草原地区，以采集、狩猎、放牧为主，其所生成的是游牧文化。“夷夏之辨”，从根本上说来，就是“文化差异之辨”、“文野”之别。文野之别在于是否有“教化”，以此分出“化内”与“化外”。华夏居中原，自以为是有“教化”之人，属于“声名文物之邦”、“礼仪之邦”的“化内”；而“四夷”无“教化”，被视为“化外”、“蛮夷之邦”的“陋民”，只能归属“荒服”之地。华夷之间由于“饮食衣服，货币不通，语言不达”，铸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障壁。然而，差异之别是相对的、暂时的，交往融合是经常的、绝对的。中原农耕文化较之北方

① 鲁迅：《准风月谈·由聋而哑》。

② 〔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

③ 〔东汉〕班固：《白虎通义·宗族》。

的游牧文化要先进，给北方民族以很大吸引力，遂有“方夷来宾”、“九夷来御”。彼此通过频繁的交往，互相吸收对方的所长，去异求同，逐渐“达其志，通其欲”，消除思想屏障，进而“和亲之”。“和亲”即表示在文化上的认同，不一定有血缘关系。

战争也是一种交往融会方式。北方游牧民族以采集放牧为主，常常超越自己的领地，进入农耕民族地区，以猎取其生产生活之所需；南方农耕民族需要安定，为求不受侵扰，遂起而防卫，往往因此发生冲突，甚而至于交战。北方游牧民族善弓马，“骑兵驰突”，“朝发夕至”；南方农耕民族惯于使用“车战”，抵挡不住“以弓马之利取天下”的“骑马民族”的攻击。战国时，赵武灵王为在战争中取胜，决定废弃传统的“车战”，易之以“骑射”，并聘请擅长骑兵战术的匈奴军官为赵国训练骑兵部队，凭借这支经过革新后的武装，消灭中山国，攻打楼烦、林胡，疆域不断拓展，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称雄一时。赵武灵王以“观乡而顺宜”、“乡异而用变”的开放思想，用胡人“骑射”取代华夏“车战”，属于军事上的变革。但要实行“骑射”，南方农耕民族就得学习养马术、射箭术、骑马术，而且南人“博衣大带”的华服不便于骑射，必须改为“上衣下裤”的“胡服”，其结果就将游牧文化的优长摄入了农耕文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胡服骑射”的变革。两种异质文化的交融，给农耕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开创了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华夏文化与胡族文化走向一统的典范。战国之后的汉、唐，也沿袭胡人骑战之术而有武功大兴的盛况。

秦朝对中国的统一，也是在兼并诸侯的基础上实现的。战国时代，秦、晋、楚、齐、燕、赵、魏各族称霸，割据一方。因而“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经过互相兼并，使各民族之间的民族意识趋向模糊，民族情感趋向和谐，民族壁垒趋向消融，这就为在语言、风俗、经济、文化上的统一做好了准备。秦朝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将统一后的中国文化在更广阔的地域和更深的程度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实行了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中华大地第一次出现了政治、经济、文化大一统的局面。

秦国能兼并六国，完全靠武功的强盛，而“五同”的实施，则靠的是统一的政令。没有强大的统一的全国政权，一统天下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全国统一的政权，是中华一统必不可少的社会政治条件。

长城的历史，也反映了南北异质文化之间由防卫封闭走向开放融合的过程。战国时代，列国竞相修筑长城，用以“互防”和“防胡”。秦并六国之后，互防的长城失去了意义，遂连接成一片，将华夏农耕区围护起来，“却匈奴七百余里”，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以后各代直至明朝，都曾修筑过长城。汉代帝王曾对匈奴单于宣布：“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有犯塞辄以状闻，降者不得受。”非常巧合的是，历代修筑的长城，恰好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长城是为“防护”而修建的，可以说是战争的产物，却又是中华文化圈内农耕与游牧两大类文明形态的分界线，其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护卫先进的农耕文明，使之不受侵扰，又是“丝绸之路”畅通无阻的保障。随着南北的统一，长城便失去了它作为“防护”的效用。大唐将农耕区和游牧区纳入宇内，对于朝廷中“修筑长城”的进谏，唐太宗只是说“安用劳民”，一笑置之。有清一代，疆土远跨塞外，已无北方之患，何须“华夷天堑”，再使文化隔绝。乾隆甚至认为：“秦人北筑长城，畏其南下，防之愈严，则隔之愈甚。”这种拆除封闭的开放观念是难能可贵的，它反映了南北两种文化终于由隔绝走向了融通。

值得深思的是，长城作为“华夷天堑”，为什么阻挡不住蒙古族和满族的南下？“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竟以其赫赫的武功，驰骋中亚和西亚，直至欧洲大陆，转而挥戈南下，突破长城，在中原建立元朝的统治；满族也步其后尘，以其所向披靡的威力，取汉族的帝位而代之，统治时间长达200多年之久。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从两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去找原因。

游牧民族以狩猎放牧为业，养成了勇于开拓、敢于进取、善于战斗的拼搏精神。军事组织与生产组织形成合而为一的整体，一旦战争需要，很快就能组成强悍无敌的武装。农耕民族则不同，他们习惯了定居